

編 者 按

在近代中國一百多年來的社會動盪中，作為整合國家權力與農村基層社會樞紐的紳士階層，其成分和政治功能也經歷了複雜的變化。與以往籠統談論鄉紳不同，林濟專門研究二十世紀30、40年代國民黨為了強化基層政權，如何扶植新鄉紳階層及其興衰。作者以兩湖地區鄉紳為對象，從是否劃分官與紳兩種身份界限、是否接受新式教育、是否鄉居，以及其身份特權是倫理道德的抑或是政治的等角度，來考察傳統士紳和新鄉紳的差別。由於這些差別，在縣以下的社會控制和政治運作中，一方面新鄉紳實現了以新族學為中心的宗族功能轉變，促使以祠堂家法為中心的血緣宗法式傳統管理的沒落；另一方面，依附國民黨政治權力的新鄉紳，也不可避免脫離了下層村落族群社會，並與大量不認同官方文化的鄉村知識份子發生衝突，導致國民黨政權對基層社會的失控。

如果說林濟的論文是從傳統士紳和新鄉紳的身份與功能的差別來考察鄉村社會的政治演變，那麼，鄭起東則是先勾勒出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在鎮壓太平軍、二十世紀初清末立憲和辛亥革命潮流中紳權三次大擴張的歷史線索，繼而比較民國時期國共兩黨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對紳士的不同政策。作者認為，在對紳士政策上，無論是共產黨的成功而有助於獲取大陸政權，抑或國民黨的失敗，兩黨做法帶來的結果，都是促使紳權的衰亡。